

傅拉都：从援华医生到使华外交官

□ 左凤荣



傅拉都是波兰人，不仅是医生，还是一位外交官，通晓波、中、法、德、俄、英等多种语言。在其富有传奇的一生中，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

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好医生

傅拉都1910年6月出生在波兰华沙一个犹太家庭。犹太人重视教育，傅拉都19岁时，便考入了华沙大学法律系，但他显然更喜欢学医，于是来到法国巴黎大学，希望未来成为一名医生。在大学里，他加入了大学生左派组织，是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傅拉都毕业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傅拉都毅然参加了由各国共产党员和左翼人士组成的反法西斯国际纵队，反对佛朗哥在西班牙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他先后担任医官、医官司令官、医疗检查官等职务，用医术救助反法西斯战士。

西班牙内战以人民阵线一方的失败而告终。1939年3月，傅拉都率领一支医疗纵队撤退到法国，被法国当局囚禁在圣西普里安集中营。经过国际援华组织“挪威救援中国与西班牙委员会”的帮助，傅拉都和其他一些“西班牙医生”被释放。1939年8月，傅拉都率领“国际援华医疗队”前往中国，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1939年9月，傅拉都医疗队乘坐“安尼亚斯”号轮船到达香港，受到保卫中国同盟领导人宋庆龄的欢迎。

被董必武赞为当代华佗

在保卫中国同盟的安排下，“国际援华医疗队”绕道越南进入中国广西，后抵达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贵阳图云关。傅拉都被聘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顾问，负责

卫生勤务指导。同年年底，傅拉都又以第691医疗队队长的身份，率医疗队前往湖南、湖北抗日前线救治伤员。在前线，傅拉都不仅积极救护伤病员，还在湖南湘阴沙田坪办了“湘阴青狮桥军医训练班”，为中国培养军医人才，以解决中国医生不足的问题。

1940年夏，傅拉都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提出要像白求恩一样到延安，与八路军一道抗日。当时国共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为了顾全统一战线大局，周恩来建议傅拉都等人在正面战场安心工作。傅拉都去延安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并没有影响他做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事，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件事。

一件是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不少人看过病。董必武曾突发疾病，在傅拉都的精心治疗下很快康复。董老高兴地称赞傅拉都为“华佗傅拉都”。傅拉都对此很高兴，他认为能与中国神医同名是非常光荣的事。另一件是使王炳南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据傅拉都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回忆：“父亲在中国工作，很快能说流利的中国话。有一次，父亲听到国民党特务密谋逮捕王炳南，那些人不知道他能听懂。父亲以最快的速度将此事告诉周恩来。周恩来请父亲帮忙，父亲随后用救护总队的车，帮助王炳南成功逃脱。”事情发生在1942年，傅拉都用救护总队的汽车将王炳南安全送到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傅拉都不仅在中国支持抗日斗争，还被派到印度为中国远征军服务。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退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在印度兰姆伽训练营进行训练，准备重返缅甸作战。1943年11月20日，史迪威将军致函中方，要求派在华中国红十字会外援志愿医师到印度兰姆伽医院服务。傅拉都带领另外9人组成医疗队，于同年12月抵达印度。医疗队在这里为中国远征军培训了不少军队医护人员。在1944年缅北大反攻开始后，傅拉都还直接参与了野战救护，直到日本投降。

傅拉都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部队把缴获的战利品送给他作为纪念，傅拉都很珍视这份礼物，把它带回了波兰。后来他的儿子把该战利品捐给了贵阳市档案馆。



抗战期间，傅拉都在湖南

致力于中波友谊的外交官

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傅拉都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波兰，在波兰卫生科研部门工作，并在血清研究中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在东欧国家政局波动中，波兰内部的局势发生了变化，傅拉都受到牵连，失去了自由。

周恩来对帮助过中国人民的援华医疗队员一直怀有感激之情。1954年7月，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在回国途中顺访了波兰等国家，他在访问波兰时，特意向波方提出想会见当年援华医疗队负责人傅拉都。傅拉都的女儿克里斯蒂娜回忆道：“周恩来总理到波兰访问，向波兰领导人提出要看望老朋友傅拉都。于是，父亲立即被释放，搬进波兰总统府附近一所高级住宅。”1955年王炳南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他发现，年富力强的傅拉都竟然赋闲在家。原来，傅拉都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王炳南问起傅拉都的历史问题到底是什么，这才知道，原来是有人质疑他曾为中国国民党工作。董必武和王炳南为傅拉都写了证明材料，交给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正是在中共领导人的帮助下，傅拉都得到彻底平反。经中波商议，1957年傅拉都重返曾经战斗过的中国，其新的职务是波兰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

傅拉都作为外交官在中国工作了7年之久。由于与中国领导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了深厚友谊，他

在中国工作期间受到了很高的礼遇。195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傅拉都受邀参加国庆10周年系列庆典活动，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傅拉都与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他为发展中波友好做了大量工作，在各国驻华使团中也很受尊敬。他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有一次路过株洲、衡阳，他激动地对中国翻译说：“你知道吗？这里的每一块土地，几乎都有我的足迹。”1964年，傅拉都回到波兰，在波兰外交部担任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司长。1972年8月2日，傅拉都在华沙辞世。

中华民族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民族，从来没有忘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过贡献的国际友人。1985年，在贵阳图云关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旧址，竖起“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傅拉都的名字也在其列。2015年9月，傅拉都的女儿克里斯蒂娜与其他国际援华医疗队队员的后人应邀来华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系列活动，并受到习近平主席接见。2016年6月17日，在访问波兰前夕，习近平主席在波兰《共和国报》发表《推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一文，在谈到中波友好史时讲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人民彼此同情、相互支持，结下深厚友谊。傅拉都、戎格曼等波兰友人不远万里来华，为中国抗日战争提供医疗支援”。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傅拉都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和中波友好作出的贡献。

（上接1版）

充分运用各种制度的力量来保证人民行使各项民主权利。除了要发挥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根本政治制度的主导作用外，还必须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深入开展政治协商、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社会协商、基层协商等多种协商，建立健全提案、会议、座谈、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等多种协商方式。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进一步健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动各政党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以团结、民主、和谐为本质属性，实现各民主党派的大陆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各方面诉求的有序表达与利益整合。进一步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充分保证基层群众在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城市的居民委员会直接行使自治权，实现对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参与、决策、管理与监督。进一步健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依法治理相关的民族事务。这些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切实执行，能够充分保证人民群众以不同方式、不同角色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从而实现当家作主，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国家和社会各个层面得以有效实施。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保障人民，全面贯彻和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将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利、维护人民利益。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人民对法治建设的参与程度，决定着法治发展的进程及其广度和深度。要不断探索有效机制，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法治实施的渠道，扩大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投身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依法保证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广泛持续深入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要坚持不断创新人民参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方式方法，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形成全面依法治国的强大合力，使全面依法治国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为实现法治中国建设而努力奋斗、贡献力量。

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制度保障。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我国宪法还全面系统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确立的各项制度和大政方针都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宪法相关法律制度，保证宪法得到全面实施。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确保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要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立法工作全过程，在高质量的前提下加快立法修法步伐，尽快构建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的良法体系，努力使每一项立法和每一部法律法规都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利益，得到人民拥护。特别是要紧紧围绕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切实加强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社保、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的立法，抓紧制定国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以良法善治保障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立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通过法治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全方位加强人权法治保障。公平正义是人民的期盼，也是法治的生命线和核心价值追求。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全方位加强人权法治保障，紧紧围绕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不断巩固和拓展公民依法享有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等广泛权利，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共同富裕的权利，积极稳妥有序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继续推进法治领域改革，解决好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用制度来促进、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坚决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确保法律公正、有效实施。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为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要，必须进一步规范司法权运行、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构建规范高效的法律监督体系，完善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健全防范冤假错案机制，努力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主任、教授】

查士丁尼瘟疫的启示

□ 王小波 张 媛

意大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叙利亚、利比亚等国都受到了这场大瘟疫的袭击。542年春天，大瘟疫传到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一直肆虐了4个月，其中有3个月属于严重传染期。

在《战史》中，普罗柯比对患者感染后的症状作了描述，即先是身体发烧，继而身体从上到下多处出现肿胀、发胀、溃烂，尤其淋巴腺集中的耳朵侧面、颈部、腋窝和腹股沟更为明显。昏迷、精神错乱、癫狂、歇斯底里者常见，跳海者也不在少数。若是侥幸逃离死神，很多人也会渐渐大腿干枯或是发音困难。其他经历者对于患者症状的记载也大同小异，通过他们的描述，人们知道，这场瘟疫就是现代医学所称的鼠疫，这在学界已早有定论。比普罗柯比小几岁的约翰也是这场瘟疫的亲身经历者，他提供了一个信息，即政府官员们清点的死亡人数达到23万时，因为实在难以

计数就不再继续了，他估计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总死亡人数超过30万人，由此可见这场瘟疫给拜占庭帝国造成的人口损失巨大。

客观来说，在人类医学史上，拜占庭医学作了不小的贡献，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古希腊罗马的医学，下启阿拉伯医学和欧洲医学，在传承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新，取得了明显成就。公元6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的医术水平尚为有限，对瘟疫类急性传染病的认识不够，知识储备不足，在大瘟疫面前无能为力，医生们眼睁睁看着这场瘟疫失控，蔓延至全国，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演变成一次惨绝人寰的人类灾难。在当时，拜占庭医术未涵盖所有领域，根据保存下来的相关文献材料，6世纪前后，医生们重点关注的领域有妇科、产科、眼科、内科等，多为常见疾病。

鼠疫有个典型的临床表现是淋巴结腐烂化脓，而拜占庭帝国医生对付

此类病症并无良方，掌握的治疗方法依然是传统的烧灼疗法。根据拜占庭历史学家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在其著作《记事》中的记载，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三世在治疗自己腿部溃烂化脓处时，还在用烙铁烙伤口，此时距542年瘟疫发生已过去600多年了。从这些记述可见，6世纪中期瘟疫暴发的时候，拜占庭帝国的医术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都是以常见病为主。因为鼠疫是第一次在帝国暴发，所以拜占庭人对此类传染病是很陌生的，帝国上下，从宫廷到民间都束手无策。据普罗柯比在《战史》中记载，面对瘟疫，医生们不知所措，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病的病因。医生们深感力不从心，不仅无解救之方，甚至连减轻患者痛苦的办法都没有，所能提供的仅是普通的护理，患者的癫狂翻滚令医生们疲惫不堪，加上对瘟疫缺乏清晰的认识，防护措施不到位，医生自身感染的也

很多。

这场瘟疫与医术之间的博弈，对拜占庭人的信仰影响较大。瘟疫暴发得非常突然，在拜占庭帝国史无前例，且态势凶猛，令全国上下猝不及防，惶恐不已。作为这场瘟疫的亲身经历者，普罗柯比在目睹了突如其来的灾难之后，心情是极其悲观绝望的，他认为这场灾难的原因无法用言语表达，也不可能作出其他解释，除非把它说成是上帝的惩罚。与普罗柯比同时代的3位拜占庭史家也是同样的看法，分别是约翰·马拉拉斯、阿加塞阿斯和埃及格留斯，他们均认为瘟疫是由上帝掌控的，只有上帝才知道瘟疫的原因和走向。

不止臣民，就连查士丁尼皇帝也是这样认为，他于公元544年颁发一项敕令，主要目的是将物价和工资恢复到瘟疫之前的水平，违者重罚。查士丁尼在这项敕令中也把瘟疫说成是上帝的惩罚。可见这是当时拜占庭人

的普遍认识，从皇帝到臣民，莫不如此。这一现象展示给我们的不仅是拜占庭人的基督教信仰，更说明了帝国上下在这场大瘟疫面前的恐惧与无奈。感染后的无法可治、无药可救、只能等死的局面，归根结底还是当时拜占庭帝国的医术水平决定的。此后到6世纪末，瘟疫又先后于558、573、590、599年4次在拜占庭帝国复发，所到之处死伤无数，哀鸿遍野，致使帝国的总人口下降了40%~50%。历史的教训惨痛，当时的拜占庭帝国在这场瘟疫与医术之间的博弈中，对鼠疫类急性传染病的医学认识不够，对来势汹汹的瘟疫没有任何有效防范措施，导致瘟疫暴发后没有能力阻击和消灭，只能任其肆虐和传播，并将瘟疫的发生解释成是上帝在惩罚人类，这是于事无补的。放眼中外历史，人类与瘟疫的斗争从未停止，若屈从于瘟疫，就会导致人类的生存危机。只有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运用科学思维方式对待和研究瘟疫，努力提高国家医术水平，摸清重大疫情防控规律，增强防疫抗疫能力，才不会任由瘟疫肆虐，在与瘟疫的博弈中抓住扭转局势的机会，化被动为主动，才能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